



地理与思想：《庄子·天下》篇的空间意识*

蒋丽梅

摘要：《庄子·天下》篇所述诸子的地理关系，体现出庄子后学具有一定的地理疆域意识，并在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图景。庄子后学以宋国地理为主要的活动区展开对当时社会思潮的讨论，但对比先秦思想的整体脉络，庄子后学的叙事不仅表现出道家本位的倾向，更潜藏着因地理空间所造成的闻见之偏狭，这可能导致其对“道术”与“方术”关系的理解问题。另外，《庄子·天下》篇对诸子的记述是“画像式”的，具有重宗本而轻物事的立场。在空间语词的使用上，庄子后学承继了庄子乃至道家思想的基本观念，并延伸其空间意识，形成多层次的空间表述，以此探寻进入道的场域的可能。

关键词：《庄子》；殷商文化；天下；空间；生死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1-0047-07

庄子后学在《庄子·天下》篇中提出了著名的“道术将为天下裂”^{[1]1073}论断，并以此为理念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学派进行了系统梳理，从道家的视域出发对儒家、墨家、名家等思想进行评述。这些思想评论从侧面展现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精神图景，但庄子后学评判意见的产生又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紧密的联系，折射出他们的地理观念和文化心理。故而本文将结合先秦时期的地理格局，对《天下》篇所列举的诸学派的地理关系及其思想特色进行研究，通过重新反思“道术”与“方术”的关系，挖掘庄子后学的空间话语和叙事，理解庄子后学潜在的地理意识、思想倾向和空间表达，探讨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张力关系。

一、道术与方术

《天下》篇开篇明确提出“道术将为天下裂”

的观点，这与《周易·系辞下》所言“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2]非常类似，但二者在思路却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周易》重在突出百家思想差异中潜藏的一致性，《庄子》则在回溯古之道术的过程中更强调其所处时代社会思潮中存在的分裂，因此他们在对各学派的表述作出价值评判时均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1]1072}来评论，意在说明各家思想相对于“道术”而言的不完美性。与“道术”相对而言的“方术”，一般被理解为方技与数术，《汉书·艺文志》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晦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3]，顾实也以为“方”为“版”，方术即法术^①。这样的理解将方术等同于一种技能之学，能较好地表达出它与“道术”之间的分裂，因此容易忽略“方”这一语词所具有的空间含义，但这种空间性又与篇名中“天下”一词

收稿日期：2025-06-0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北京师范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 京师书院全球发展与治理跨学科研究专项经费”(YKY-2024-T0017)。

作者简介：蒋丽梅，女，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主要从事道家哲学、魏晋玄学、比较哲学研究。

中的空间性特征相呼应。

按照《天下》篇的文意，“方术”更应被视作一曲之学，“天下之人各以其所欲焉以自为方”^{[1]1073}，陆西星以为“方术，道术之局于一方者也”^{[4]824}；钟泰也指出道术与方术的区别在于“全”与“分”的问题，认为“既有方所，即不免局执”^{[4]825}。“方”本指并行的两船，后被用来表示左右与东西，指称某一区域或者方位，比如《礼记·曲礼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郑玄注就说：“祭四方，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5]2746}。可见“方术”也可被理解为“一方之术，有在有不在也”^{[4]827}。这种空间上的有限性与无处不在之道术形成对比，不仅反映出“方”的地域性特征，也象征着方术在效用上的不足。因此，“方术”也被理解为一种“成见”“偏见”，《天下》篇之所以称“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也正是要批评百家拘泥于自己的一隅之见而自以为是的困境。

除了“方”以外，《庄子》中还有“天下”“宇宙”“无穷”这样的语词，均用于对极为广大空间的描述。其中“天下”兼具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的双重意涵，王威威指出，老子的“天下”主要有三种含义，其中第一义就是至大的地理空间，即“天地之间”，并强调“天下”作为地理空间的含义最为基本^②。《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6]

这里“天下”所指示的范围要远大于邦国之域，从身至家、乡、邦、天下的空间链条，其本质是要求主体不为其生存的地理空间所局限，突破生命的生活场景去追求无限的精神场景。这种见蔽的过程正是“观”的意义^③。但与《老子》不同，《庄子》中的“天下”经常被表述为国家的代名词，带有更强的政治空间意味。比如“尧让天下于许由”“为天下”“治天下”，这里的“天下”带有疆域的属性，指有限的国土面积。因此《庄子·大宗师》中南伯子葵向女偶求教学道工夫时，首先从“外天下”始，这仍然是在用“天下”的政治意涵。而另一组“海内”和“海外”的表达也是其

试图描述广大空间的尝试，《庄子·逍遥游》云“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1]35}，神人居于四海之外。袁珂认为：“所谓四海者，谓中国东南西北四面之海。此盖古人想象中之天下。”^[7]尧从海内走向海外的尝试，正是要突破“天下”疆域的束缚走向远大。《庄子》中还有对“宇宙”的明确解释，《庄子·庚桑楚》云“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1]801}，“‘有实而无乎处，’谓四方上下实有所际，而所际之处不可得到”^[8]，至大之所，物无所际，没有分野和阻隔，也就是《天下》篇所说之“一”。

而《庄子》一书对极大空间的描述，其目的是将其作为道的场域。庄子后学也以“六通四辟”形容道术无所不至、无所不在，林希逸认为这是为了表达道术“东南西北上下，用无不可也”^[9]，道作为万物存在的始因和根据，是至广大的存在，因此能够遍布所有的空间，而道的空间广布又可以反过来成为道自身真理性的论述。但《庄子·齐物论》又提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1]86}的观点，我们由此可以推论，至大之极未必一定在于广袤无垠，也可成为现实之微处。因此，庄子后学以“裂天下”来讨论方术之偏失自身也失之偏颇，他们对“百家往而不反”的悲叹，并未能洞察各家之术自身也是道术在某一方面的落实，这也使《天下》篇的判断成为一方之见，从而显示出庄子后学精神图景中的局限性。

二、诸子的地域关系和《天下》篇的叙事倾向

关于《天下》篇的作者，学界一般认为该篇是庄子后学所作，方勇、刘心宇对该篇作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辨，在此不再赘述^④。本文仅从庄子自身的学脉传统出发来进行讨论。《庄子·列御寇》所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1]1067}，是全书关于庄子弟子较为明确的记述。《庄子·山木》又云：“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成玄英对此疏解说：“姓蔺名且，庄子弟子。”^{[1]699}蔺且也是目前唯一见录的庄子弟子姓名。我们也能在《庄子》

全书特别是内篇中看到很多对庄子言语的记载,这些记录者也可能是庄子后学。而目前《天下》篇所评述的百家之学,涉及邹鲁之士、墨翟与禽滑釐、宋钐与尹文、彭蒙、田骈与慎到、关尹与老聃、庄周、惠施、桓团、公孙龙诸人,并从“道术”的对比视野中对诸子进行了点评,由于其对关尹与老聃、庄周的态度,我们也常常将此篇视作庄子学派从道家视野出发的学术思潮的总结。

通过分析《天下》篇的文本,我们可以窥见庄子后学的地理疆域意识。全篇所提及的诸子有着明确的国家归属,其活动区域也大体清晰,他们分属于邹、鲁、宋、楚、齐、赵诸国,其中墨子、禽滑釐、宋钐、庄周、惠施均为宋人^⑤,彭蒙、田骈、尹文均为齐国人。慎到、公孙龙为赵国人,老聃、邓陵子之属为楚国人。从数量对比来看,庄子后学表现出对宋人及其思想的熟悉度更高,考虑到当时诸子活动区域的广泛性,可以看出他们非常了解墨家(包括后来墨子后学)、稷下学派、名家等思想,但对儒家学派仅以“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名之。他们对诸子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宋国及与之接壤的楚国、齐国,所以从地理概念来说,庄子后学较大可能仍主要居住在宋国地区,其中慎到因活跃于稷下而见录于此,公孙龙、桓团因与惠施辩论,也未成为其论述的中心。此外,《庄子》全书较少涉及燕、韩、魏、秦这些地区,贾学鸿在《〈庄子〉名物研究》一书中对《庄子》中的人名进行了系统统计,认为出现的人物主要集中在宋、楚与鲁国^⑥,这也可与上文的结论相参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10]韦昭《国语》注认为,蒙地是宋公子鲍的采邑。酈道元《水经注》中又说:“汜水又东径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汜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11]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宋城”云:“小蒙故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12]宋国东北城门为“蒙门”,盖由此门可至蒙城。《庄子》一书中也多次提及宋人故事,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142]、“宋人有曹商者”^[11052]等等。宋国是商纣王庶兄微子的封国,在文化上仍保留殷商旧习,故而宋国别称为“商”,王国维猜测说:“宋与

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13]早期宋国疆域广袤,“西至宁陵,东到夏邑,北至山东曹县,南至柘城一带”^[14],但到了战国初期,由于国力贫弱,其西部疆域虽为魏国吞并,但仍“东到今江苏徐州地区,南到今安徽宿州,西到商丘地区西部,北到山东菏泽、定陶一带”^[15]。宋国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地处齐、晋、楚等大国之间^⑦,但宋国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繁荣,是“中国膏腴之地”^[16]¹¹⁷²,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庄子久居宋国,楚威王时期曾至楚地,谏言楚王伐越之事。庄子生活的年代^⑧正值宋王偃在位时期,此时宋国正面临着被灭国的严重危机。特别是宋王偃称王后,当时社会政治逐渐由“仁政”转为“王政”,崇尚勇力和杀戮。宋国末期时政治黑暗、穷兵黩武,宋王偃被称为“桀宋”。公元前286年,齐闵王联合魏、楚伐宋,宋王偃被杀,宋国被灭,但是庄子并未及见宋国之亡^⑨。由《庄子》中所载“庄子将死”可推知,庄子后学所见之世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庄子·则阳》云“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缊,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县众间者也”^{[1]884},《庄子·徐无鬼》言“越之流人”^{[1]823},这两篇描述了细腻的思乡之情,也可管窥后学对故国往思的深刻体会。

但是在对宋国诸子的叙事中,《天下》篇对诸子的记述是“画像式”的,呈现出了强烈的价值倾向。以庄子的好友惠施为例,《庄子》一书共有七处提及二人之间的论辩^⑩。除了二人的互辩题材以外,《庄子》中还有许多关于二人言谈的记述,如“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1]843}、“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1]607}。另王叔珉先生所辑佚的《庄子佚文》中还有两处关于庄子与惠子相见时的言谈记载。在《天下》篇中,庄子后学虽然盛赞“惠施多方”并保留惠子“历物十意”,但却认为:

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1]1114-1115}

这种叙事塑造出了惠施作为“辩者”的形象,却忽略了其在事功上的经历。惠施为魏国相二十余年。《吕氏春秋》高诱注云:“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为惠王相也,孟子所见梁惠王也。”^{[17]493}在出任魏相期间,他在国家内外事务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就内务而言,他为魏惠王立法,“立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17]493};就外事而言,他先是促成魏惠王与齐威王的徐州之会(公元前334年),后又联合楚国大败齐军于徐州(公元前333年),提供了灵活的外交策略。但从其基本立场来看,惠施仍主张“合纵”,主张以魏合于齐楚。后来张仪至魏,“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18]219},魏王采用了其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策略,惠施试图说服魏王未遂,“易衣变冠”,被迫离魏至楚,楚王“乃奉惠子而纳之宋”^{[16]559}。惠施也深得宋王礼遇,《战国策·楚策三》评价说:“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16]559}其后惠施活跃于魏、楚、赵等国,作为国之使者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总的来看,惠施长期以伐齐、抗秦为主要的政治目标,主张“去尊”“偃兵”^⑧,但《天下》篇的评述则以惋惜惠施之才为基调,在“天地之道”的广大视野下指出其在“于物”之道上的平庸与悲哀。《荀子·非十二子》与《天下》篇有类似的立场,也批评惠施“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19]。后来,《太平御览》卷466记载:

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焉。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皇,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20]

可见,这段材料与庄惠二人是辩友的关系不符,表现出庄子对惠子的轻视态度,是对庄子后学态度的一种极端化的演绎。同样,庄子后学在对慎子的论述上也与慎子本人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对比慎子的佚文来看,《天下》篇论及慎子的思想时评价说“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只勉强承认他们“概乎皆尝有闻者也”,部分地肯定慎子学说的价值。而对比现存慎到的残篇,《天下》篇相对忽视慎子对法与势的建构,更为突出地寻求慎子与本派思想的相近之处,因此《天下》篇中的慎子和其本人之间存在着形象

的断裂^⑨。

在对百家的态度上,《天下》篇作者对墨子、宋钐、尹文、彭蒙、田骈、慎到等都有批评之言,却称赞关尹、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对庄子也有批评之辞,由此可见道家特别是庄子后学的基本立场。在其表述之中,庄子后学以“一”为标准,认为仁义、礼乐、度数虽本根于一,但分别对应于圣人、君子、百官及百姓,故而未能达于“天人”“至人”的境界。在庄子后学对诸子的叙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重宗本而轻物事的立场。

三、空间的社会性与空间表达

《天下》篇形容庄子之言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运用神话传说、荒诞和想象,在实际生存的空间世界基础上将真实与虚拟交织在一起,使主体认知从实存空间延伸出来,在所见、所闻、所传之世外构建起一个广博的天地空间,探索安顿精神的理想世界。《庄子》中所言及的实存之名物、山川与河流,是庄子及其后学实际生存的物理世界的真实记述。但在真实空间中,庄子与庄子后学的世界因政治的变动和世代的变化也略有差异。

对比《庄子》的内篇和外杂篇,我们可以看到在内七篇中并未见到关于秦国的记录,但在外杂篇中则有四处论及秦国,分别为《列御寇》“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寓言》“老聃西游于秦”以及《田子方》和《庚桑楚》所提及的秦穆公和百里奚之事。这四处除“宋王使秦”外,其他均为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庄子后学对于当时日益崛起的秦国及其思想并不十分了解。这一点也突出地反映在《天下》篇中,全篇在论及当时天下百家之学时也并未涉及秦国之人或秦国之思想。此外,《庄子》内篇多处化用孔子、颜回等儒家人物,但是《天下》篇仅以“邹鲁之士”来指称儒家人物。而与庄子同一时期的孟子主张“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墨”^[21],韩非又评论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18]456}。可见,从对时代思潮的总结来说,当时各家各派都有其明显的主观取向,而就庄子后学的主观取向而言,其中很大的原因来自自

己所处的地理场域。

正如上文所述,庄子后学对当时学派思想的了解仍然是以宋国为中心展开的。贾学鸿曾指出宋地处于中州境内,《庄子》中反复出现了许多与中州地域相关的事象^⑧。就庄子后学而言,宋国是其了解天下的空间本位与客观生活的地理疆域,宋人是其主要身份标识,宋国的文化、宗教、习俗等构成了其社会生活的底色。这些共同内化为他们建构世界认知的潜意识。但宋国自身的历史使宋人的空间认知带有双重的不确定性。首先,宋国作为殷商后裔在周朝封国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尽管他们与鲁国一样被封为公爵,但“于周为客”,这种“客居”的现状使他们在文化心理上更加鲜明地突出其所具有的殷商文化的特征。顾炎武就提出:“宋公朝周,则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22]其次,庄子后学直面了宋国的灭亡,这使他们在殷商遗民身份之上又被附加了一层宋国遗民的身份,而宋国作为国家在地理空间上的消失,使他们丧失了得以确认其个人身份的地理和政治基础,因此他们不得不更倚重于其文化身份。客居与遗民的心境促使他们更为自觉地展开对宋国及其所延续的殷商文明的反思,并对诸侯之间的战争提出批评。

在点评出生于宋地的思想家时,《天下》篇特别关注葬礼和战争这两个议题,这固然是宋地思想家们本身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也同时成为庄子后学记述的重点之处。殷商文化崇神重贾、好祭厚葬,《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5]3563},周朝则主张“事鬼敬神而远之”,宋国作为殷商后裔保留了他们重祭和厚葬的风气。《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23]这种葬礼的规制与《天下》篇所记载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1]1078}形成鲜明的对比。生死之变的核心在于形体的生命力,个体对空间的占据标志着人的生存,葬礼则是对个体死后空间的处置及其态度的体现。墨子主张废除旧俗,

无论贵贱,一律不使用椁,并以三寸厚桐棺送葬,事实上是对宋国以人殉葬和奢靡之葬的激烈批评。根据《庄子·列御寇》的记载,庄子以生死为流变,弟子按照宋国习俗想要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1]1067}这里庄子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丧葬的态度,比墨子的薄葬之说要更为彻底。而《庄子·养生主》中的秦失吊老聃、《庄子·大宗师》中的子桑户死和孟孙才善处丧、《庄子·至乐》中的庄子妻死等,也都表明庄子以人生为逆旅,以不葬言葬,强调生死一体,从根本上否认人是一种具体空间的存在,自然也就反对人们对死后空间的安排,将死亡视作生命向气的自然复归。

在战争问题上,出身宋地的宋钘、墨子、慎子都坚决反对战争,这种观念与宋国的地理位置及宋国的军事战略密切相关。宋国地处齐、晋、楚等大国的环伺之中,虽较之卫、郑、鲁来说有着更强的国家力量,但在各国的混战中不得不时刻在攻守之中作出选择。宋襄公曾扣押滕宣公、攻伐曹国,但后来宋国在与楚国争霸之战中落败,自此以后宋国国力衰退,长期处于依附与妥协的立场,不得不以守为要。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宋国曾协调晋楚两国组织了弭兵大会,达成“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协议,两国共分霸权,避免了激烈的战争,使小国有了休养的机会。顾颉刚总结认为:“兼爱,非攻,节用都是宋人思想与宋俗。”^[24]《天下》篇中记载出身宋地的宋钘,特别讨论他所主张的“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1]1085}的观点,《韩非子·显学》也认为:“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图圉,见侮不辱。”^{[18]458}《孟子·告子》也记录了宋钘尽力游说楚、秦二王罢兵之事。庄子后学也称墨子为“才士”,总结认为“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1]1072},《墨子·非攻下》云“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25],他明确反对大国对于小国的兼并战争,墨家善守御,曾急奔从鲁赴楚以止楚攻宋。慎子亦有“偃兵”之论,公孙龙曾说:“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17]1142}

在庄子后学的生活经验中,国家的倾覆、生命的无奈和社会空间的变动使得他们在现实生

命空间维度上呈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和短暂性,发出“苒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1]100}的感叹。他们寻求突破现有生命的牢笼,追求一种更为确定与永恒的存在,这就是道的世界。从有形入于无形,不为物形所束缚,从人的生命存在来说,未尝有生且未尝有死,而人之形不过是一时之寓所,人既寓居于具体的空间场地和社会情境,却又需超离于所处之实境。故而庄子学派不断延伸自己的空间意识,以不同的表达层次来阐明他们对空间的感觉。庄子及其后学的言说以宋及其邻国为起点,拓展至四海之地,他们对空间的描述从陆地走向海洋,并讨论到南冥北冥的极地,尽可能穷尽地理疆域的极限。但是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这种空间的有限性,《庄子·秋水》篇借北海若之口言:“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1]566}除了以宇宙论视角消解现实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的权威性,他们还采用“外”和“野”两种语词,以否定的方式描述出一种空间的无限。比如“四海之外”“六极之外”指向人所未及的广阔世界,“圉垠之野”“无极之野”“广漠之野”等概念以人的平面视觉的延展,帮助人摆脱城邦、文明和政治的限制,走向非人文的无限空间。庄子学派在空间秩序上重新建立起一个从“人”到“天地”“无极”以至于“无始”“无穷”的空间框架,将人的生命从平面带入立体,使人正视自己渺小的现实存在。除此以外,他们还描绘了藐姑射之山、无何有之乡、玄水等意象,指示出似无却有、说有仍无的空间存在,它们既是道家精神追求的栖居地,也是现实空间与理想空间的交错。这些意象在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人从当下超拔出来,进入道家的生命图景之中。《庄子》一书还通过鲲鹏展翅、莽眇之鸟等语词,消除了空间于实存上的厚重感,模糊了空间的尺度和边界,通过运动和变化为人的向道之途插上想象和工夫的翅膀,使人在与天地同流中通过精神之往来到达道的场域,走入“寂寞无形”的道的世界。

综上,比较庄子和庄子后学对空间语词的使用,通过梳理《天下》篇所述诸子的地域及其活动,我们能发现庄子后学在全篇诸子记述背

后暗含的空间线索,并在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中形成独特的精神图景。在文化心理上,庄子的弟子们仍以宋地为主要活动区,并以宋国所承继的殷周文化为核心,追念旧国的心理和面对国破的惨痛成为其隐性的话题和关注点。在精神生活上,他们又延续了庄子乃至道家思想的基本观念,在现实生活的不确定中追求确定,突破有限以寻求无限,形成了复杂的空间表述,并建构起不同的层次。《天下》篇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史的总结,但如果将庄周后学对诸子的评述置于先秦学术发展的洪流之中,通过“道术”与“方术”的对比,可以发现庄子后学的评判自身也呈现为一隅之见。

注释

- ①顾实等著,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②王威威:《〈老子〉“天下”观念的三重含义》,《哲学动态》2024年第12期。③陈少明指出:“视觉上还存在‘见’与‘蔽’的另一种对立。对物体的任何一次观察,都只能见到其中的一个侧面,而看不见其位置相反的一面,故有所见便有所蔽……有根源性追求的思想家就会出来揭蔽,或者叫做思想考古。”参见陈少明:《生命的精神场景——再论〈庄子〉的言述方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④方勇、刘心宇:《关于〈庄子·天下〉篇成文时代及作者身份、立场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⑤孔子亦为宋国贵族后裔,孔子学礼于宋,其娶妻、还乡祭祖、周游列国都与宋国密切相关。关于孔子与殷宋关系的论述,参见朱凤祥:《宋国史稿》,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208—217页。⑥⑬贾学鸿:《〈庄子〉名物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205页,第206页。⑦三家分晋之后,宋国为魏、齐、楚三国所包围,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⑧关于庄子的生卒时间,任继愈先生曾归纳出五种不同的说法,参见任继愈:《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目前学界主要采用范文澜先生所持公元前328年—公元前286年之说。⑨具体考辨可参见马叙伦著、李林点校:《庄子义证 庄子天下篇述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878—890页。⑩分别为《逍遥游》论大瓠和大樽之有用无用、《德充符》论有情无情、《秋水》鱼乐之辩、《至乐》妻死鼓盆而歌、《徐无鬼》天下皆羿皆尧、《外物》论言之有用无用、《寓言》讨论孔子是否勤智服知。⑪《韩非子·内储说上》作“偃兵”,而《战国策·魏一》则作“案兵”,参见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36页。⑫蒋丽

梅:《〈天下〉篇慎到“弃知”之说辨析》,王中江等编:《从前子学时代到子学时代——边际人物、文本和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538—546页。

参考文献

- [1]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182.
- [3]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780.
- [4]方勇.庄子纂要: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 [5]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 [6]王弼.王弼集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144.
- [7]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126.
- [8]王叔岷.庄子校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7:895.
- [9]林希逸.庄子鹪斋口义校注[M].周启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492.
-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43.
- [11]酈道元.水经注校证[M].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557-558.
- [1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80.
- [13]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64.
- [14]阎根齐,刘海燕.先秦宋国史若干问题初探[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1):93-95.
- [15]马世之.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339.
- [16]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7]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187.
- [1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9]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93-94.
- [20]马叙伦.庄子义证[M].李林,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773.
- [21]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5903.
- [2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20:78.
- [23]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4116.
- [24]顾颉刚.古史辨:第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8.
- [25]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219-220.

Geography and Thought: Spat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Chapter *Tianxia* of *Zhuangzi*

Jiang Limei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recorded in the chapter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of *Zhuangzi*. It argues that the later followers of *Zhuangzi* possessed a certain awareness of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distinct spiritual landscape within both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spaces. The later followers of *Zhuangzi* engaged in discussion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trends primarily within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the Song state.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overall context of pre-Qin thought, the narratives of the later *Zhuangzi* school reveal not only a Taoist-centric tendency but also implicitly the parochialism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hared by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This may lead to ide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shu*” (art of the way) and “*fangshu*” (specific methods or techniques). Additionally, the accounts of various philosophers in the chapter *Tianxia* of *Zhuangzi* are “*portrait-style*,” characterized by a stance that emphasize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hile downplaying concrete affairs. In their use of spatial terminology, the followers of *Zhuangzi* inherited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Zhuangzi* and even Daoist thought, extended their spatial awareness, and developed a multi-layered mode of spatial expression, thereby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entering the realm of the Dao.

Key words: *Zhuangzi*; Yin-Shang culture; *Tianxia*; spatiality; life and death

[责任编辑/木 卯]